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董必武

颜吾芟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 苏双碧

副 主 编: 陈君聪

编 委: 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玲

马宝珠

责任编辑: 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董必武

颜吾芟 编写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
新华书店经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

K821

137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北京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011-1257-6/K·168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董 必 武

顾吾芟 编写

目 录

一、投身辛亥革命	1
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7
三、湖北大革命的领导者	12
四、从中央苏区到陕北	20
五、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	29
六、怒向蒋家王朝	38
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贡献力量	45

一、投身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以武昌起义为标志，在湖北武汉揭开序幕。消息很快传到距武汉仅100多公里的黄安县，一名青年闻讯后，兴奋异常。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剪去头上的辫子，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连夜赶往武汉，投身辛亥革命。为了表示决心革命，坚决反清到底，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必武”。这位青年就是后来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学名用威，号璧伍。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县城南正街一个拥有近30口人的清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董基文、四叔董基明都是清末秀才，很有学问，在当地以教书为业。他们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鄙视趋炎附势，很受人们尊敬。由于生计来源少，全家每天只吃两顿饭，小必武经常到城外采野菜充饥。清贫、艰辛的生活，父辈们刚直不阿的性格使董必武从小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从不交不正派的朋友。亲邻们常常称赞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董必武自幼聪颖慧敏。5岁起随父亲上私塾念书。父亲对他要求严格，每天天刚亮就把他喊醒，起床苦读。在父亲和四叔的指导下，小必武阅读了大量书籍，他尤其喜好文史。家里的藏书很快被他读完了，于是他又去亲友家借阅。

一次，小必武借得一部《纲鉴》，如获至宝。书主限定一个月归还，谁知到28天他就来还书了，书主一问，小必武不仅通读一遍，还做了简要的读书札记，令书主大为吃惊。

董必武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统治的末期。腐朽的满清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加紧镇压盘剥，政治黑暗，国势日益衰危。人民反抗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党人活动频繁。这期间，有两件事使董必武认清了满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并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一件事是在董必武参加科举考试时发生的。董必武出身读书人家，父辈们希望他能考得功名，获取一官半职，光宗耀祖。1903年，17岁的董必武在家人催促下，来到黄州府参加府试^①。当时黄州府管辖黄安等8个县，这次应考者达3万人之多。入考场时，一考生因拒绝侮辱性搜身检查，竟被狐假虎威的舍人和卫兵毒打致死。事后又想抛尸灭迹，引起公愤。数千考生群起包围考场，要求惩办凶手。董必武极为愤慨，积极参加了这次风潮。众考生坚持两日，后经清兵镇压，才告平息，考试继续举行。董必武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榜上有名，考中了秀才。但是他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反动官吏的残忍有了深刻的认识。

另一件事是，同年8月，董必武继续到省城武昌应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城，对一切都感兴趣。在抚台衙门前，他

^① 清朝每3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即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乡试前，先要举行县、州、府试，府试考中者为秀才。

好奇地探头向堂上张望了一下。这一看遭殃了，衙役们见他穿着破旧，土里土气，便恶狠狠地扑上来，以“窥探”罪名将他毒打了一顿。这件事对董必武的刺激非常大，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他对腐败的清朝官吏深恶痛绝，对朝政与仕途彻底绝望。他怀着满腔怒火，弃考回乡，离开了武昌。

两年以后，1905年，在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下，董必武又一次来到省城。11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提倡新学的文普通中学堂。董必武在“文普通”读书5年，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深受老师们的器重。在“文普通”学习期间，董必武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

“文普通”是当时湖北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阵地之一，著名的革命党人宋教仁等都曾在这里读书。后来宋教仁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校方开除，但校内仍有革命党人的活动，董必武所在班上就有同学从事革命活动。他与这些人来往密切，感情很好。

距“文普通”不远有一个湖北革命党人开办的书报阅览室——“日知会”，负责人是刘静庵。“日知会”陈列了大量的国内外进步书报，如《警世钟》、《猛回头》、《新民丛报》等，任人阅览，传播新思想，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日知会”每周还举办一次公开演讲会，讲述世界大事、中国的危机以及救亡救国的道理。董必武经常去“日知会”阅读书报，倾听演讲，眼界大为开阔。

在“日知会”，首先吸引董必武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张

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他很喜欢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刊载的一些反封建、反八股的文章颇感兴趣。他觉得这些文章文字犀利，见解新颖，富有感染力，一时成为康梁著作的热心读者。

后来经朋友介绍，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非常喜欢董必武，经常和他一起谈论革命思想，并主动给他介绍一些进步报刊和揭露清朝残暴罪行的书籍阅读，其中《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给董必武以深刻影响。这两本书分别记叙了1645年清军南下时野蛮屠杀扬州和嘉定人民的血腥暴行，激发了董必武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

1906年，刘静庵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酷刑折磨，体无完肤，昏厥数次，仍坚贞不屈，醒后继续痛骂不绝，后死于狱中，被誉为“铁汉”。噩耗传来，董必武悲痛欲绝，对反动的清王朝更加恨之入骨。同时也为革命党人那种为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慷慨赴死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他始终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

在董必武考入“文普通”前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随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发行。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立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倡导民主立宪，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政权。1906年

4月28日，《民报》第三号发行专号，列举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若干根本分歧，对改良派展开了全面论战。相形之下，改良派的反驳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缺乏后劲。董必武在“日知会”阅读了两派论战的全部文章，他反复思索对比，并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逐渐认识到，康梁思想乍看新奇，实际上内容陈腐落后，而孙中山主张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统治，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的希望。于是他断然抛弃了康梁的主张，完全接受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省第一中学堂（文普通中学堂的改称）。他很想再继续求学深造，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好忍痛回乡教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感到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武汉，在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军需部任职。此时，清政府已经调集重兵向武汉扑来，企图扼杀革命。10月16日，战斗首先在汉口刘家庙、三道桥一带展开，董必武被派到兵站，负责军需供应。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起义军伤亡很大，董必武和兵站的工作人员都拿起了武器参加战斗。保卫汉口的战斗持续了半个月左右。11月1日，汉口终于被清军攻破。不久，汉阳也失守，起义军被迫退守武昌孤城。董必武转入武昌军政府军务部任秘书官，负责动员组织武汉各地人民支援起义军，打击清军。

武昌起义后，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南方12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宣告独立，北方陕西省和许多州县也纷纷举行起义，树

起了独立的旗帜，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迅速瓦解。清政府刚刚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镇压革命起义的元凶袁世凯，企图利用局势实现个人野心。12月1日，袁世凯主动向武昌方面提出议和。革命党人立即表示同意。很快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从此武昌再无战事。战事平息后，董必武被派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后被提升为财政局总务科长，为军政府筹谋财源，解决财政困难。这年底，董必武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仅仅过了3个月，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就被袁世凯篡夺。4月1日，孙中山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随后，南京临时政府迁往袁世凯的老巢北京，辛亥革命遂告失败。

董必武密切注视着政治时局的发展，他看到帝制虽然倒了，但继之而来的是大地主、官僚、军阀的独裁统治，革命人民所渴望解决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改善都没有得到解决，革命很不彻底。

“难道革命是这样的吗？”董必武百思不得其解。1913年夏，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武装讨袁失败，董必武等革命党人在国内已不能立足。第二年，董必武在朋友资助下东渡日本，考入以法科著名的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一面学习新知识，一面继续寻求新的革命思想。此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正在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建中华革命党。经人介绍，董必武第一次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亲切地与他长

谈，鼓励他在失败以后不要灰心丧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一席话使董必武倍受鼓舞，对于孙中山这种坚持革命毫不气馁的精神，他更是敬佩万分。不久，董必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1915年6月，董必武受孙中山的指派秘密回国，从事反袁活动。次年，复辟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但是，在帝国主义操纵下，中国仍旧处在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依然到处碰壁，得不到结果。1918年，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然而再次以失败告终。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使董必武越来越感到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已穷途末路，要革命就必须寻找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革命力量。

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象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也惊醒了中国人民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正处于彷徨之中的董必武从报纸上看到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为了尽快了解俄国革命的实质，他以急切的心情写信向在日本的朋友索取有关资料。

1919年3月，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汉俊。李汉俊带回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情

况的书籍，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读完了《马克思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心中的疑问渐渐地被解开了。他越读越兴奋，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董必武在上海时正值“五四”前夜。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发展。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广泛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董必武广泛阅读这些进步书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尤其使他爱不释手，每期必读。对于《新青年》杂志竖起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董必武更是积极赞成和热烈拥护。这期间，他经常和李汉俊等人在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共同研究十月革命和中俄两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总是失败呢？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涤荡着封建文化的纲常伦理，激发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五四”运动深深地影响着董必武，他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运动。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以支持学生，并对这次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董必武亲眼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初步展示了力量，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心情极为振奋。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长期的斗争实

践和“五四”运动的胜利经验，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象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革命”。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唯一可行的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能彻底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总结孙中山领导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是，不依靠工农而总是依赖军阀的“路子不对头”。他回想在过去的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往往只在社会上层，在军阀政客当中活动，忽视了教育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由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因而必然遭到失败。董必武通过“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对比，认为“革命要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这个“新兴势力”就是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见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董必武的这些思想表明，他已经由一个民主主义战士开始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明确了革命的道路后，董必武决定一切都从头做起，去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他立即返回武汉，于1920年3月和陈潭秋等进步教师共同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大量招收工农子弟入学，为革命培养人才。

1920年，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积极筹建共产党组织。这年夏天，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上海小组。不久，董必武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建议他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非常高兴，立即行动

起来。他找到陈潭秋商量建党事宜，得到陈潭秋的热烈赞同。董必武又约曾与他一起参加同盟会、一同赴日留学的密友张国恩商议，三人首先结合在一起。后来，又有刘伯垂、包惠僧、郑凯新、赵子健等4人参加，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小组成立后，他们马上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随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在私立武汉中学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他们走向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接近工农。当时，董必武除主持武汉中学的工作外，还在湖北省立女师、启黄中学、省立一师、旅鄂湖南中学等学校教书，传播革命的种子。由于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所以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人都认识这个“嘴上留着小八字胡，头戴瓜皮小帽的忠厚长者”，很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新思想。这些学校和陈潭秋等人活动的国立武昌高师及其附属小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汉口致忠学校、共进中学、省立一中、省立政法大学、医科大学、高等商业学校、国立武昌外语专门学校、高师附中等学校都先后建立了青年团组织，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基地。很快一些学校掀起了对旧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知识分子接近工农，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群众中去，董必武又和陈潭秋等人创立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会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版了《新教

育》杂志。他们通过这些形式，发动武汉中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师生，在社会上办起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等，还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在农村举办了各种农民夜校。这些学校全部实行义务教育，使广大工农子弟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接受了革命思想，为以后工农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董必武还领导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深入到工厂、铁路、码头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和他们广交朋友，向他们讲解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并在他们中培养先进分子，为发展工人运动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小组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小组的活动情况，并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在讨论党对孙中山的态度时，少数代表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以自己多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体会，说明孙中山不是军阀，他的思想有进步性，孙中山曾经对中国革命起过促进作用，应予以肯定，不能把他与军阀等同对待。陈潭秋积极支持董必武的看法。最后，多数代表同意了董必武的观点，从而为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发展壮大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董必武还与李汉俊一起为大会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如实地总结了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对大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根本保证。董必武参加了建党的一系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和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湖南的毛泽东并称为“南陈北李、两湖毛董”。

“一大”后，董必武返回武汉，立即着手正式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组织的工作。不久，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担任主要负责人。从此，湖北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

三、湖北大革命的领导者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董必武是这一方针的积极拥护者。第二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选举了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的指

示，董必武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在湖北主持筹建国民党省党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25年10月中旬，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了以董必武、陈潭秋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党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14人组成的执委会，其中共产党员占11名，这样就使湖北国民党组织从一建立就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湖北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仅半年多时间，全省的国民党党员就由数百人增至3千多人，其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占70%以上。国民党组织发展到30多个县。与此同时，董必武还特别注意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在他的指导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优秀的国民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到1926年4月，湖北全省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大革命前夕，湖北是直系军阀统治的一个重要省区，帝国主义也把武汉作为侵略中国腹地的据点，各种反动势力在这里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使湖北人民遭受无尽的痛苦。

为了推动湖北人民的反帝斗争，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倡导下，1924年9月，武汉各人民团体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董必武、陈潭秋担任了同盟的执行委员。大同盟多次组织武汉各界人民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董必武立即发动湖北各界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成立中

国工人罢工后援会，积极组织募捐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工人、商民也相继罢课、罢工、罢市，并连续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董必武还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各县宣讲“五卅”惨案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使反帝运动遍及全省各地，有力地配合了上海人民的斗争。6月11日，汉口英军枪杀示威工人数十名，制造了“六·一一”惨案（汉口屠杀案）。与此同时，封建军阀也加紧镇压人民运动。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湖北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怒涛。在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武汉人民成立了沪汉案救济会，全力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工人的罢工斗争很快从武汉发展到大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在斗争中，董必武、陈潭秋领导湖北人民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把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1926年初，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把准备北伐战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为此提出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等省迅速、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接应北伐军。董必武遵照党的指示，立即指导湖北国民党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3月下旬，董必武奉命秘密前往长沙，做湖南军阀唐生智的工作，争取他转向革命，为北伐扫清阻碍。当时，唐生智正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隙，董必武会同广东国民政府派来